

虞云国:王安石的半山园在南京人心里

2021年12月18日,是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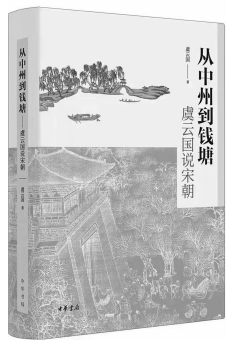
1000年,这个数字足以让人陡然生出对时间的敬畏感,但对南京城的百姓而言,这千年的时间跨度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续。

南京城东“半山园”,这片因王安石在南京的晚年居所而得名的区域,是南京人心目中的一处“桃花源”。一千年之后,“半山园”早已踪迹难寻,但王安石留给后人的千年文脉在热气腾腾的烟火生活中绵延到了当下。今天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们,可以兴之所至和你聊王安石在南京的足迹,聊他骑着毛驴在钟山养老,聊他和苏轼的相会,然后随口吟出王安石的诗词名篇。

这样一种别致的文化现象,在宋史学家虞云国看来颇具意味,“历史是从滚烫的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虞云国也从中看到了历史“普及”到大众身上的价值所在。

研究宋史40年,虞云国从20年前开始便将重心从专业论著转移到大众普及,在尊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一直在探索贴着读者说宋史的最佳路径。今年73岁的他多次在抖音、B站等新兴媒体平台开课,近日他的新作《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由中华书局出版。虞云国的心意很明确:把宋史讲给大众听。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虞云国

1948年出生于上海,浙江慈溪人。著名宋史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著述颇多,近著有《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三声楼读记》等。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等。



历史学者虞云国 受访者供图

对话

敬畏历史是每一个国民应该有的文化修养

读品:昨天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和大众说王安石变法时,您会怎样介绍?

虞云国: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从中国改革史的角度来看,王安石改革的深度,恐怕是继商鞅变法以后最了不起的一次改革。

对于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以往我们中国宋史学界主要是强调它到底是富国还是强兵。实际上,王安石的最高理想,是想对宋代的官僚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北宋是通过科举制度入仕的士大夫政治,王安石希望官僚体制改革得更好,从而让国家更强大、更理想。但官僚体制依附在君主专制下,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君主。

可以看到,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在谋求各自的君权和相权的层面上最终还是有了裂痕。尽管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回到南京后,宋神宗还是把王安石新政的主要部分推行下去,但是他又把权力重新集中到君主手里,新政实际上就此中断了。君主集权制下面这种儒家理想主义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今天我们不能因为后变法时期,蔡京等人的贪污腐败和新的权贵集团的形成,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主义成分,那种理想主义是很可贵的。今天我们纪念、研究王安石的价值,正是要从王安石新政的成败得失中汲取历史的资源。

读品:您出版过一本《敬畏历史》的随笔集,这四个字您怎样解读?

虞云国:敬畏历史不光是我作为一个文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学术使命,实际上也是每一个国民应该有的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如果不敬畏历史的话,你就不能够获得历史的真相,就会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你敬畏历史,就能坚持进步理性的现代价值。

读品:宋人的读书法对今人有什么借鉴?

虞云国:欧阳修曾记载了一位著名宰相钱惟演的读书故事,他是钱穆王的后代。钱惟演读书有三个状态,第一个状态是坐在椅子上,一本正经地看儒家经典和史书;第二种状态是躺着的时候,看小说;第三种状态是上厕所的时候,带上小词儿,也就是宋词。这三个状态蛮有代表性的。我把自己的书房称作“三声楼”,对我来说,专业阅读是第一种状态;看非宋代的其他历史著作,相当于宋人读小说的第二种状态;第三种状态是消遣的,在书桌旁,阳光下,捧杯茶,读点诗词、散文,最惬意的。今天的读者完全可以借鉴宋人的读书状态,能做到第二、第三种状态不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吗?

读品:有什么新的出书计划吗?

虞云国:最近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我新出了一本书,叫《学史三昧》,包括我对历史观、史学方法论、历史书写等问题的见解,在自序里我阐述了每个人都应该捍卫自己参与历史、记录历史与书写历史的权利。

1

“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他是南京作为自己第二故乡的。”

怎么看得出来?虞云国说,那首著名的《泊船瓜洲》就是明证——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在诗中写长江两岸的京口(今镇江)、瓜洲(今扬州南部),但落脚点分明在钟山,“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地方不是别处,他期待回的家正是南京。

十多岁时,王安石因父亲在江宁(今南京)任职,随迁到南京居住。父亲因病逝世后,王安石在南京钟山守孝、读书。王安石就此与钟山之间建立了割舍不断的生活联系与情感契合。他曾三次担任江宁府长官,两度守孝、两度辞相后居住于此,先后在南京生活了近20个年头,逝世后又葬在钟山脚下。

南京人最感亲切的莫过于王安石的“半山园”。那是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回南京建的宅子。起名“半山园”,是因为宅子坐落在江宁城东门外至钟山的半道上。王安石由此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南京老百姓讲的王安石骑着毛驴游钟山的故事,不完全是八卦。”虞云国笑道,“王安石是比较反对坐轿子的。有一个传说,王安石说坐轿子就是人家抬你,你就变成人上人了。”

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卧睡,往往至日昃乃归。”一位老者,骑着小毛驴,穿行钟山间,一幅优哉游哉寄情山水的画面栩栩如生。在此期间,王安石遍寻南京古迹,写下了许多后人传诵的名篇佳句。

百姓们相传的王安石晚年与苏轼在半山园相会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虞云国说,历史上确有其事。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苏轼路经南京,来到半山园拜访大病初愈的王安石。身穿布衣的苏东坡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昔日两位政敌此时冰释前嫌,畅谈文学,王安石甚至劝苏东坡在钟山与他做邻居,两位大家风范气度尽显,为历史留下一段佳话。

当然,南京对于王安石的意义不止于半山园这一段。“王安石进入中央以前,当时朝野舆论说‘安石不出奈天下何?’就像当年谢安一样,王安石不出来这天下怎么搞得?其实

当时王安石就住在南京。不论从他的政治生涯,还是他的学术生涯来说,南京对他的影响都太大了。我们可以这么说,江宁造就了王安石,王安石也为南京这座城市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而且这印记一千年之后还在。”

在虞云国看来,老百姓口口相传的那些“八卦”也是王安石印记的一个部分,而且十有七八是有一定历史影子的,“老百姓有时候不管王安石变法有多大的意义,但会对一个在南京生活过的人的生活细节感兴趣,这是一般民众在历史趣味上和专业学者不同的地方。认识本身是多元的,要允许宏大的叙事,也要允许有趣的轶事。”而这些,对历史学者的研究来说也是有所启发的。

2

虞云国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读大学时已经30岁。他就读的上海师范大学以研究宋史为特长。虞云国朝夕和《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大部头典籍打交道,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对虞云国的学术研究作出过“以生命注入史学的痴情”的评价。

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算起,虞云国将自己四十年的宋史研究生涯以每十年为界,分为四个阶段。前二十年,他读研读史,赴日访学,专攻学术宋史研究,当他的心中藏了一整个宋朝世界,从第三个十年开始,他决定将研究重心从学术转向大众普及。

“历史学何用?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更有必要让当今全体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在随笔集《敬畏历史》中,虞云国表达了转变的初衷。

事实上,普及并不比学术容易,在虞云国已经出版的多部大众读物中,都能看到他下的功夫。新作《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是他学术论文外宋史文章的全面集结,书分为四辑,里面也蕴藏着他对普及宋史的内在逻辑。前三辑分别由大事件、人物、文化专题切入,他从中找到有新意的叙述视角,而他最看重的是第四辑“朝代纵论”,体现了他对于宋代全局的一些看法,比如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生态、台谏制度、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问题等。让虞云国颇感欣慰的是,书中收录的文章前后跨度20年,但他再编辑的时候,有“不悔少作”之感。时间恰恰是研究历史的“试金石”,那些比较深入、准确、全面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具有生命力。

3

也是在这样的接连探索中,虞云国的使命感逐步清晰了起来,“这十年没写过几篇像样的论文,而是把学术性研究融进历史普及文章中,将学术文章‘翻译’成白话,让大众读者看得懂。”

虞云国再也没想到,在古稀之年,因为讲宋史他竟尝了一把当“网红”的滋味。

去年世界读书日,《水浒寻宋》刚刚出版,出版社邀他做一个直播,讲一讲瓦子勾栏的情况。虞云国想,何不来个创新?这就有了《一个考生的汴京一日》这个即兴之作。

在那次直播中,虞云国带领网友们穿越到嘉祐二年(1057),他将自己的“人设”定为去参加礼部试的越州新昌县考生。大相国寺、樊楼、瓦子勾栏,在虞云国的讲述中,这些宋代地标一一生动呈现。

从抖音到B站,虞云国网络上的读者渐渐多了起来。严谨的史学态度和普及历史的责任感,在虞云国身上交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反差萌”。

不管选用哪一种形式做普及,“抓住真相”始终被虞云国视为历史学家的生命线。“‘真相’是历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词。如果我们把发生过的历史作为一种状态的话,这个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还原的。这给了历史研究者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充分地辩证地利用史料考证,尽可能地逼近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比如,基于“真相”,他反对“宋粉”讴歌的所谓宋代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我们不能光看到宋代留下来的物质文明,那时候小老百姓贫苦农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虞云国也在很多文章里强调,宋代立国的制度设计有它开明的地方,但开明的政治随着皇帝和时代的变化,产生了一种异变。到南宋高宗时期就有了绍兴体制,实际上把北宋完全拉向倒退,形成了完全转向内在。

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虞云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历史,但现实有的时候和历史形成一种“通感”。“不是简单地类比,但是有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会给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提供一种资源,形成一种认识,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通感,历史起了这个功能。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历史的真相。你脱离了历史真相,你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这是针对当前的历史写作,虞云国所持的态度。这三句话掷地有声,虞云国说,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他会用毕生精力来践行。